

印度邏輯和原子論

對正理派和勝論的一種解說

〔英〕亞瑟·伯林戴爾·凱思 著

宋立道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印度邏輯和原子論

對正理派和勝論的一種解說

〔英〕亞瑟·伯林戴爾·凱思 著

宋立道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印度邏輯和原子論：對正理派和勝論的一種解說 /
（英）凱思著；宋立道譯．—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
2013.12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63-4

I. ①印… II. ①凱… ②宋… III. ①因明（印度邏
輯）—研究 IV. ①B81-093.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03285 號

印度邏輯和原子論

對正理派和勝論的一種解說

著 者：〔英〕亞瑟·伯林戴爾·凱思

譯 者：宋立道

責任編輯：立 人

出版發行：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貴陽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張：13.5

字 數：310 千

版 次：2014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7-81126-663-4

定 價：78.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品質問題，請與出版社聯係調換

電話：0851-5981027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為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為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公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為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公元之初，佛教並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公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累。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然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累累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法一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並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譯者的話

本書的英文原名為 Indian Logic and Atomism (《印度邏輯和原子論》)。書名雖然非常現代化，其實內容還是很傳統的。它反映的是上一世紀初西方的印度學研究水準。不過，恐怕我們也不能說今天的印度學研究就已經超越這個水準了。無論東西方，現在的人文學界——也許還包括更廣的學術界？——其實都很忙碌，流行語稱作“浮躁”。一位老學者前些年跟我說，古人寫書，一輩子寫一本；古人刻書，一輩子也刻不了幾本；如今的人怎生了得，有的教授，一年就能攢出幾本來。著作等身的事，已經成了小兒科。但亞瑟·伯林戴爾·凱思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1879-1944) 先生不屬於此列，他若見了今天的出版繁榮，肯定要汗如雨下。伯林戴爾·凱思的本書，研究了古印度思想當中最重要兩個宗教哲學派別——正理派和勝論派。這兩個派別正好可以作為典型，代表印度思想當中的知識論和本體論的成就。知識論，按照西方的學術分類標準，包括了邏輯學在內。勝論關於世界構成的基本範疇，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勝論師的名稱，說起來我們中國人以往並不陌生，著名的唐三藏玄奘法師從印度回來，就翻譯過《勝宗十句義論》。漢傳的佛經當中，《大莊嚴經論》、《因明入正理論》、《百論疏》、《成唯識論述記》等都提到過勝宗理論。一句話，勝論派是古印度的一支重要哲學或宗教哲學派別。至於正理派，像龍樹這

樣的印度佛教思想家以及陳那等人，也都提到過。《正理經》是最早的印度邏輯著作。它直接影響到後來佛教的因明學的形成。

我們對本書的作者的情況說幾句，然後再大致介紹印度哲學的一般理論特色以及印度思想的宗教傾向。譯者的意思，是用盡可能簡潔的語言，向讀者介紹，在印度文化背景下，通常我們今天所說的哲學本體論、知識論、解脫實踐論是如何內在地聯接起來的。

本書作者亞瑟·伯林戴爾·凱思可以稱得上是 20 世紀最著名歐洲東方學者之一。他是蘇格蘭人。其父是律師，其兄威廉·約翰·凱思在當年的印度殖民地做官，執政於當時尚屬於印度殖民地的緬甸行省。凱思本人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受教育，畢業于愛丁堡大學。以後又曾在牛津的巴略爾學院學習。有十餘年的時間，他是英國王室的律師，受雇於政府殖民地事務部。他也在印度做過官，對印度古典文化充滿感情。其學術研究的興趣主要在吠陀經典及古梵語方面。這位非常多才多藝的學者，在法律、政治學方面的成就並不低於其在印度學領域內的耕耘所得。他與愛丁堡大學的關係極深，今天，愛丁堡大學的圖書館仍然保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大批藏書。

伯林戴爾·凱思先生博聞強記，學問淵深，他對梵語、梵語戲劇和詩歌，對於印度神話，對於從奧義書到往事書，以至正理學派和佛教因明家的著作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述自然也涵蓋了所有這些領域。他在印度的文學、語言學和哲學經典方面的研究，使他獲得很高的學術聲譽。1990 年，他的傳記出版時，爲了表達對於這位學者的尊重，該書的副標題就採用了印度傳統中讚譽大學問家著作的方法，他的傳記作者稱其爲“蘇格蘭學術的大花 (the chief ornament of Scottish Learning)”。這個傳記的作者是席思

(Ridgway F. Shinn Jr.)。

凱思先生的《印度邏輯和原子論》出版於 1921 年。本書集中地探討了古印度兩個理論立場非常接近的派別，它們同屬於吠陀系統中的六派哲學。凱思教授在本書中主要地研究了與佛教相對立的正理—勝論派的邏輯學與本體論作品。這一過程中，他涉及了吠檀多派的商羯羅、佛教的陳那等論師。關於印度哲學和正理學說，凱思寫過不少的文章與著作，像《印度和錫蘭的佛教哲學——從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以及“世親和〈論軌〉”(Vasubandhu and the Vadavidhi)、“因明入正理門論的作者考(Authorship of the Nyayapravesa)"等。我們還得不厭其煩地再說一句：在上一世紀的 20 年代，這些作品都是居於思想史研究界的前列的。

要理解正理派與勝論派哲學，有必要大致看一下這兩家在印度哲學的總體系中的位置。也有必要知道印度哲學的理論本質及思維傾向。印度有一部著名的哲學百科全書，稱為《攝一切見論》(the Sarva darsana sangraha)。從這部書中，我們看到：在印度，任何哲學見解——無論它們是否同意有神論——都被承認是印度思想的一部分，儘管前面我們說了，宗教取向是印度哲學的第一特徵。必須說明：印度人的玄思，從一開始就是放在尋求人生的價值意義的，就是要評判生死的價值。他們眼中，並不存在純粹理性思維活動的快樂與遊戲。印度人絕不會贊同為思辯而思辯的取向。當馬達婆大師(Mādhāvacārya)在編寫其《攝一切見論》時，無疑認為一切形式的人生見解，都可以放到哲學的或者宗教哲學的體系中來。在印度，理論主張或意見被稱為 darsanas，也就是佛經裏面的“見”或“見解”。但是有一點，印度的各家哲學派別都有一個約定俗成的立場原則——所有的思想和主張都應該也可以放

到同一個基準線上或同一個原則下來考校。這是一切哲學討論的前提。任何一位哲學家在陳述自己的見解以前總要表述他的對手，也就是因明常說的敵證一方的見解。這種自所成立的主張稱作前宗 (purvapaksa)，它是相對於後宗而言的。前宗是對立一方的意見，對這種意見進行了駁斥，然後才會由立論者出示自己的主張。駁斥，也叫破斥 (khandana)。那在破斥之後出現的才是哲學家自己的主張和對此主張的證明，後者就稱作隨見 (uttarapaksa)——隨後的主張，或者結論 (siddhānta) 了。結論又被稱作在印度邏輯中稱“(道理)成就”。

由於對異己的思想可以持平等的態度，也可以包容和吸納對立的意見或見解，印度思想寶庫中才能最終實現紛繁競呈。他們也有自己的“百花齊放”的思想環境。從消極一面說，我們可以說印度思想缺少明確的時間觀；但從好的一面看，正是這一點使印度人覺得：其實太陽底下並無新鮮的東西。無論什麼思想，莫不是以前出現過的，也可以說，沒有什麼思想是根本非法的或完全荒謬絕倫的。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一切存在都是相對的東西，今天是昨天的明天，今天也是明天的昨天，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什麼思想稱得上真正的新，也沒有什麼思想一定是不可救藥地陳舊。一切都屬既有既成。因此，在主流的印度教吠檀多的經典中，在大乘佛教的經典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見解——順世論的、佛陀的、耆那教的、數論的、瑜伽派的、彌曼差派（聲論）的、正理派的以及勝論派的思想。印度思想本來就有綜合的特色，一切有關生命意義的思想都在各家的思想中獲得各各應有的地位。每一種思想體系都從一定的視角加以組成而成爲百科全書式的宗教哲學。印度的種種宗教哲學派別都會有異教或者異端的稱呼，但那其實只

是一種異見，從字面說，只是思想上的不同看法和見解，並不因此成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只是進入近代以後，才有以劍與火來從肉體上消滅異己的做法。

印度的哲學，按傳統的說法可以分為正統的與非正統的兩個部分。前者就被稱作 āstika 而後者就稱作 nāstika。前者指的是吠檀多等的六派哲學，後者指耆那教和佛教之列。六派哲學當中，至少一開始，在原初的時期，也有同佛教一樣有無神論傾向的，例如數論與彌曼差派就認為世界并非大自在天的作品，儘管他們也同意吠陀經典的神聖性質。其實，印度古代遠不止只有六派宗教哲學，它們的數目要大得多，所以佛經裏面還說，有九十六種外道或者數目可以更多。

本書的重要內容是對印度邏輯學的研究。邏輯學，我們知道，人類思想史上有三大系統：希臘的、印度的和中國的。中國的本色邏輯指墨子的邏輯學。正確地說，指墨子學派的後學所組織起來的那種邏輯。從時間上看，墨子邏輯稍晚於希臘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邏輯體系。根據胡適先生在他的《先秦的名學》一書中的研究，晚期墨家的邏輯已經有了歸納與演繹的推理。後期墨家關於辟、侔、援、推的一套理論，還真是非常講究的認識方法和論證方法。可惜中國人無論生活中還是治學問，都沒有保存這門學科。說到邏輯，無論是希臘的，還是中國的或者印度的，最初都產生於辯論活動。可以簡單地說，邏輯生於論辯。中國邏輯生於名辯學者，只有在東周末期社會瓦解、“禮崩樂壞”的情況下，才可能有人出來批評時政。名辯家們都是古代的“自由知識份子”，像鄭國的鄧析專門針對子產這樣的政治家，從語言上鑽“法家”的空子；而惠施這樣的名辯家對於莊子的語言邏輯創造有很大的啟發性。在印度

哲學，語言論證和與之相聯繫的語言邏輯，從來就是捍衛和證明宗教教條的工具。印度的邏輯，單純地從時間上看，可以分為古代的正理邏輯與近代的新正理邏輯。如果考慮到佛教方面對於正理派邏輯哲學的借鑒，佛教的因明——其實在印度背景下，佛教通常也稱這門學問為正理的——也分為古因明與新因明。

“因明”這個名稱，似乎是由我們漢地去印度取經的唐三藏的發明。譯者一直疑心這個據稱為“*hetu vada*”的名詞，是玄奘或他的高足那位叫窺基的發明出來的。這就像前些年，我們曾盛談過“動員社會力量辦學”，後來為了讓外國人知道這個中國特色的教育理念，我們的新聞界曾杜撰了一個“*run education through mobilizing social forces*”，我們猜想，外國人看見這個 *social forces* 時，聯想到的是什麼武裝力量或民兵之類的在辦教育。話還是說回來罷。佛教因明，從留存至今的梵本上看，玄奘譯為因明的，其實原文並無對應的梵文名詞——如像《因明入正理門論》就是一例。佛家因明的學術史，通常以陳那菩薩為分界線，前為古因明而後為新因明。本書的研究的對象，是正理派和勝論派。此二家比陳那生活的五世紀早得多了。從歷史上看，正理與勝論起初是各不相同的思想系統，有著各不相當的發展道路。但是，這并不妨礙兩家的共同的哲學目的，有相互同情的哲學方法論。不僅如此，在印度歷史中，他們還走得越來越近，在中世紀的晚期也就形成了一個派別，叫做正理—勝論派。

粗泛地講，正理—勝論在歷史上的共同發展有 2400 年之久，從公元前 6 世紀一直到今天，時盛時衰，盛時影響到各家哲學；最弱的時候，也還是不絕如縷。正理派與吠檀多派一樣，都可以稱為印度哲學的寶庫。大約公元前 4 世紀，喬答摩·足目就創立了《正